

文獻研究

一本打通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全球史著作 ——楊斌教授《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讀後

劉旭康*

摘要 楊斌教授於2021年出版的中文版《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以原產於馬爾代夫群島的海貝為研究對象，重點解析了“海貝”及其衍生的“貝幣”如何實現全球範圍的流通。作者以切實豐富的文獻為基礎，以高遠、深刻的問題意識為導向，視野廣闊，為讀者奉獻了一部精彩紛呈的關於海貝的全球史著述。

關鍵詞 海貝；貝幣；馬爾代夫；全球史

楊斌教授在〈致謝〉中稱：“如果從2000年夏開始了解雲南的海貝算起，本書歷經十八春。”¹《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正是作者多年來不斷關注“海貝”和“貝幣”等研究對象的總結，從成文來看，其立意之深遠，視角之廣闊，資料之豐富，實不枉然。

從中外學界的過往研究來看，自二十世紀初，陸續有學者對散落於世界各地的貝殼、海貝及其用途予以關注。約翰·維爾福萊德·傑克森(John Wilfrid Jackson)在1917年出版的《貝殼作為早期文化遷徙的證據》一書中主要探討了貝殼、海貝在全球流通過程中承載的文化意義，這些海貝的特殊用途與當地某些習俗發生聯繫，從而顯示出海貝在文化遷移中的作用。²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1934年出版的《黃土地的孩子——史前中國研究》一書中運用大量的考古實物資料，主要探討了包括使用貝殼意象、裝飾在內，並以仰紹文化為代表的史前中國文明。³稍後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外海貝研究便以伯希和(Arthur Christopher Moule)為代表。藉着精通多種語言的優勢，伯希和利用各種語言的原始文獻，結合當時能夠用上的考

古資料，集中分析和介紹了當時已知的海貝的名稱、來源、使用範圍、兌換率等內容，但沒有提到非洲的海貝使用狀況。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簡·哈根多恩(Jan Hogendorn)和馬里恩·詹森(Marion Johnson)探究了貝幣在非洲歷史上的奴隸貿易和棕櫚油貿易中的使用情況。⁵對於中國境內海貝流動的研究而言，與南亞、東南亞有特殊關係的雲南成為重要的關注對象，如楊壽川編著的《貝幣研究》收錄了12篇論文，分別從雲南使用貝幣的起始和廢止、雲南貝幣的來源和流通、以石寨山和李家山古墓為代表的貝幣實物分析、雲南長期使用貝幣的歷史、文化原因等多種角度，對歷史時期雲南地區的海貝與貝幣的流動予以綜觀。⁶此外，還有周智生對古代滇印之間貝幣流通的討論。⁷近人如錢江教授則從馬爾代夫群島的海貝貿易入手，探討印度洋範圍內以馬爾代夫群島的海貝貿易為中心，通過海路向亞非歐大陸輻射的路徑與意義。⁸

通過梳理以往研究成果，不難發現以“海貝”為題且真正以全球史視野觀察並探討其全球化過程的著述並不多見。毫不誇張地說，目前為止只有本書達到了立足全球、溝通中外地觀察散落於世界各地的“海貝”與“貝幣”問題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上說，此書無疑可以作為“海貝”全球化研究的里程碑。

* 劉旭康，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

—

全書計 42.2 萬字，凡十章。作者在第一章〈全球現象，地方特色〉中，提出本書旨在“撰寫貝幣的全球史”，其結構設想是一方面按照地區展開，另一方面大致根據貝幣演化的時間向前推進。對此，書中沿用了如印度、中國、東南亞、歐洲、太平洋諸島、東方、西方等地區性空間概念，並挑戰形成這些地理空間概念的界限和邏輯。

第二章〈源自馬爾代夫：採集和出口〉為全書設定了主題背景，此章回顧了馬爾代夫自起源至十七世紀的歷史，強調了馬爾代夫作為東西方海上交通和貿易要道的地理位置。本章還介紹了馬爾代夫的特產，突出其作為海貝主要產地和供應地的特點。

第三章〈自印度始〉關注的是海貝最早被用作貨幣的地區——印度。在短暫回顧海貝在印度社會的文化和宗教功能之後，講述了海貝被本地貿易以及跨地區貿易用作貨幣的過程，然後考察了貝幣是如何從孟加拉地區傳到阿薩姆和印度北部地區，藉此討論不同時期貝幣在印度紛繁複雜的貨幣體系中承擔的角色和作用。作者亦在本章末尾勾勒了英屬殖民地時期，貝幣被殖民政府承認、使用以及最終被代替、廢棄的過程。

第四章〈東南亞：亞洲內部的互動〉將目光轉移到了東南亞。其中，作者藉助泰國、中國和歐洲文獻來追溯貝幣在東南亞的傳播和演化，進而表明貝幣在這一地區的使用情況，不僅彰顯了印度的影響，而且其作為跳板把這一貨幣習俗從東南亞帶到了中國與東南亞的交界處——中國雲南地區。

第五章〈雲南：印度洋的痕跡〉考察了近代之前貝幣在雲南的崛起與沒落。從地理上看，雲南地區位於東南亞與中國的交界處，因此作者認為雲南無論從族群上看，還是從經濟和文化上看，都有着非常濃厚的東南亞色彩，甚至

也受到了印度的影響。九世紀以後在雲南流通了七八百年的貝幣，就是一例。本章回顧了古滇國使用的海貝，討論了其來源和性質，並着重分析了從南詔後期開始在全球和地方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貝幣在雲南地區繁榮、延續、衰落直至消逝的過程。

第六章〈並非貨幣：先秦中國的海貝〉根據考古材料和文獻中關於海貝的記載，詳細討論了先秦時期中國的海貝，首先駁斥了南海是先秦海貝來源的既有觀點，指出海貝在先秦時期是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藉此可理解中華文明形成和歐亞大陸交流的微妙作用，並深入討論了商周時期的海貝為甚麼不是貨幣，以及海貝為甚麼沒有變成中國最早的貨幣等問題。同時，作者也提出仿製海貝的“銅貝”（如楚國的蟻鼻錢），不僅成為中國最早的貨幣（金屬鑄幣）之一，亦是海貝留給中國的豐富有趣的文化遺產。

第七章〈西非：連接舊大陸和新大陸〉將視線從印度洋以東轉到了海貝世界的西部——非洲。作者認為最遲在十四世紀，西非已經採用海貝作為貨幣。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歐洲商船將不計其數的海貝從印度洋經歐洲運到西非。歐洲商人在西非先是用海貝交換黑奴，然後將黑奴運到新大陸，再用海貝交換西非的棕櫚油，然後將之運到歐洲，滿足工業革命的需要。然後作者進一步說明這個印度（亞洲）—歐洲—非洲—新大陸的網絡對於歐洲接觸並深入亞洲和非洲社會發揮着關鍵的作用。同時，這個跨區域的網絡也塑造和加強了美洲的殖民制度。作者指出，海貝不僅幫助了歐洲殖民者滲透進非洲社會並從中榨取資源，而且也參與了構建達荷美王國這樣依賴奴隸貿易的畸形王國。最終，先是來自於印度洋，之後產於東非沿岸的大量海貝抵達西非，海貝傾銷導致了貝幣的貶值和崩潰，貝幣制度在十九世紀末葉隨之消亡。

第八章〈太平洋諸島和北美：孟加拉體系之外〉通過介紹太平洋島嶼和北美使用海貝或

文獻研究

貝殼作為貨幣的一些案例，進而說明這些土著社會使用的海貝並不來自馬爾代夫，他們對貝幣的使用與以孟加拉為基礎的貝幣制度無關。作者在本章採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和理解貝幣的歷史、貨幣的起源以及貨幣與權力的關係。

第九章〈不僅僅是錢〉探討了海貝在不同社會中的非貨幣功能，以及海貝與貝幣留下的記憶和遺產。本章先是概述了海貝在亞非歐大陸上的各種功能，隨後着重回顧了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學者對於非西方社會中的海貝的解讀，最後作者認為至二十世紀中葉，海貝貿易雖然一去不返，貝幣也已然消失，但他們在非洲社會和非裔族群中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和宗教痕跡，而這些痕跡也成為了一種新傳統。

第十章〈貝幣世界〉統攬全書，分別從地方性、區域性和全球性這三個層面以及經濟史的角度，對海貝貿易和貝幣進行反思。作者在本章中重申貝幣是第一種全球性貨幣，從跨邊界的角度探討了海貝貿易和貝幣對全球史的意義，並藉此對全球史中的一些熱門問題和範式如“西方的崛起”“亞洲互動”“世界體系理論”，以及佐米亞（Zomia）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後，作者總結了貝幣的盛衰起落，提出以“貝幣世界”這一概念來概括這個跨地區、文化和社會的經濟空間。最後，作者進一步提出貝幣世界或許可以成為全球史的一個新範式，但仍需要時間的檢驗。

二

通覽全書後，不難發現本書有以下特點。

一是立意深遠，視野廣闊。本書的出發點是寫就關於“海貝”和“貝幣”的全球史，其中不僅有“海貝”和“貝幣”流通的客觀論述，還有作者關於全球史、區域史等史學理論層面的思考。比如作者在開篇第一章就提到“海貝”遍佈亞歐非大陸，研究對象分佈的廣泛則要求作者需要用全球視野觀察具體區域的物品流動。在理論探討層面，作者用一節的篇幅專

門就全球史與區域史的關係予以討論，他認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史觀念便逐漸為學界所接受，實際上與跨地區、跨國、跨文化以及其他類似的概念是同義的。一方面，“全球”一詞似乎只是強調全球化，具體表現就是討論、觀察某個事物向全球擴展或被捲入全球化的過程。但其實不然，全球史和全球視野（global）的倡議者強調的是地方性和全球性在參與和塑造全球化的力量、因素、過程和結果時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以避免對全球化的片面理解。同時，作者還引用了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維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等人關於全球化的觀點，試圖從東南亞的歷史發展中找到全球化與地方化互動的證據。此外，就討論的地域而言，作者也真正達到了全球史的討論範疇。

作者視野之廣闊還體現在陸海兼顧，古今兼有，這點非常可貴。比如在時間的縱向維度上，自先秦武商至二十世紀，作者都有相當程度的把握；而在空間的橫向維度上，其述及的海貝產地主要在馬爾代夫，之後是東非沿岸，其流通地域更涉及印度、中國雲南、東南亞、西非等諸多地域。正如作者所言：“貝幣的出現既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又充滿地方特色。”⁹此外，所謂通道不僅在海洋上流動，也有陸路運輸，比如作者就提到從暹羅到雲南的通道，他在此處引用馬歡、黃省曾關於兩地間通路的描述，可以明顯看到這條通道是東南亞海貝輸送至雲南的重要管道。

二是資料種類多樣，數量豐富。作者一開始就對如何選擇、閱讀、引用一手和二手資料有自己的識見，他認為：

人們常常詬病世界史大量依靠二手文獻，本書也不免如此。不過，如果我們歷史學家自己都不能信任自己的同行，那麼，所謂學者之間的對話還有甚麼意義呢？其實世界史學者所做的不僅僅是吞噬二手文獻（包括地區史學者的研究），世界史學者還要對印度、東南亞、中國、

西非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積累的豐富多彩的關於海貝的原始材料和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勤奮閱讀、全面理解，同時加以批判性反思，這樣才能表現出對相關材料、學者和學術的尊重與肯定。¹⁰

在資料來源方面，本書除了採用傳統的漢文文獻外，還有阿拉伯、印度、歐洲地區各種史料，其中尤以遊記記載這類為重，比如作者常常用到的《中國印度見聞錄》《道里邦國志》《伊本·白圖泰遊記》《巴爾博薩遊記》《皮拉德遊記》，等等。另外還有法典類文獻，如從梵文翻譯成波斯文的《簡圖法典》、泰國的《孟萊王法典》等，引用這些法律文獻是因為當地一些違法之事，多以相較於金、銀而言面值較小的海貝作為罰款，由此可以觀察海貝、貝幣在當地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同時，作者也特別注意運用考古資料，如利用泰國碑銘觀察貝幣在泰國的使用歷程，以及考察先秦時期甲骨文和青銅彝器上的銘文（即金文），“生動地揭示了在中華文明形成初期，這種海洋動物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宗教文化上的重要意義”。¹¹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在很早之前便顯露頭角的海貝文化即使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十分珍貴和突出的。關於商王武丁（約公元前十二世紀初）之妻婦好墓出土的大量海貝的來源、用途等問題，作者也在總結其他學者的基礎上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即這些海貝絕非如傳統觀點所言是由南海而來，而是源於印度洋（主要是馬爾代夫），經草原之路或其他道路抵達中國。書中豐富多源的資料無疑為主題的論述提供了有力支撐，其最大的意義便在於互相比勘，從而更接近歷史事實。

三是語言輕快簡練，內容編排富有層次感。比如作者對馬爾代夫國王如何選擇海貝貿易的合作夥伴是這樣描述的：

很顯然，馬爾代夫蘇丹喜歡沿襲傳統，和孟加拉、坎貝以及錫蘭的老夥伴們一起繼續壟斷海貝貿易，歐洲人如果直接

到馬爾代夫來購買海貝，恐怕不利於蘇丹的權力和權利，因此，蘇丹的擔心不是毫無依據。¹²

關於馬爾代夫王室壟斷群島海貝貿易的問題，錢江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歷史上，馬爾代夫群島的統治者（包括古代的女王以及中世紀的蘇丹酋長）對當地的海貝收購及出口貿易擁有絕對的壟斷權。這一由當地土著王室壟斷貿易的傳統延續了至少一千多年，大約從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萊曼記載當地海貝貿易之濫觴，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末期。¹³

還有作者在每章之前都附有饒有趣味的引語，比如第三章〈自印度始〉便有一句孟加拉地區的俗語——“放下海貝，帶走你想要的”，¹⁴生動簡明地顯示出海貝在孟加拉的內外貿易中擔負着極為重要的一般等價物功能。另外，作者在具體寫作中會出現一些看似與小標題沒有直接關聯的材料和敘述，但細究後會發現其實與章節主題相呼應，體現出從表面的不相關到章節邏輯上的連貫。如作者在討論全球史觀念時，提到食物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以茶、可樂、麥當勞等為例，對食物在全球化中的代表地位進行闡述，從而引出海貝這一商品在闡釋全球史中的獨特視角。

四是問題意識強烈。作者在本書中將已解決的和未解決的問題都擺到明面上來，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向讀者坦示。比如，作者在第二章中談到從馬爾代夫到孟加拉的船隻的壓艙物從之前的沙石變成了海貝，認為“海貝佔據了商船必然要留給壓艙物的空間，從而騰出了作為商品的海貝本來需要佔據的貨艙空間”，¹⁵然後在這一基礎上提出如何在海洋貿易經濟學層面上闡釋這種現象之問，但似乎還未有較為滿意的答案，期待讀者能給予解答。再如，本書雖是關於“海貝與貝幣如何全球化”的討論，但明顯可以看出作者也兼及討論了許多其他問

文獻研究



圖 1. 1976 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海貝，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Gary Todd, Public Domain via Flickr <flic.kr/p/fYDnvg>。）

題，包括運送海貝的船隻形制，當中有許多阿拉伯船隻，這些船不用鐵釘連接，而是用椰索縫合。他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阿拉伯船隻建造的特點，即用椰索捆綁船板，船體不用鐵釘和油灰”，並再作補充論述。¹⁶ 這種廣視角、多要素的觀察無疑對聯結各種現象的能力提出挑戰，但同時也容易迸發出問題的參差。

三

以某種商品為中心進而書寫其全球傳播的歷史已然是一種成功的範式，從早期的白銀，到之後的咖啡、茶葉、棉花等，¹⁷ 再到楊斌教授這部以海貝流通為中心的全球史著述。這些優秀成果無疑為我們觀察歷史提供了全面、聯繫、

發展的視角，此點毋庸置疑。從個人有限的觀察出發，私以為此書尚可在以下兩方面進行完善。

一是著者可有針對性地添加一些關於商旅群體的活動信息，比如適當探討有哪些從事海貝貿易的商旅群體？穆斯林商人、猶太商人、亞美尼亞商人、歐洲殖民者甚至華商等商群在其中的具體表現、作用如何？其目的就是要在討論中“既見物又見人”，否則忽略商人這一主導要素的話，則會有礙貿易鏈條的完整表述。因為在筆者看來，商品不像流水一樣可以自行流動，貿易成行的背後一定是以“人”，特別是商人為主導。海上商業貿易的成功固然需要諸如運輸工具、季風、商品等各種要素的配合，

但這些客觀要素也絕不能離開商人主觀趨利的推動。另外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雖然商旅群體難有明確的姓名、籍貫等信息記載，但並非完全不能描述，作者或可嘗試進行群體性、規模化的審視。比如錢江教授在論述以馬爾代夫群島為中心的海貝貿易時，除了描述海貝的種類、捕撈方法以及市場指向、流通區域外，同時也注意到負責買賣、運輸海貝的印度商賈等群體，雖然篇幅相對較短，但也表明了人一物間的主次地位和關聯態勢，從而使得海貝貿易中有了“人味”。

二是有書中的一些細節可能需要修正。如作者在第五章〈雲南：印度洋的痕跡〉中的〈江南來的海貝〉一節，集中討論了琉球在中國、琉球、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中購買、使用海貝的問題，這一點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因為過往有關琉球對外貿易的研究多集中於中琉、日琉之間，對其與東南亞關係的討論鮮有深入。然而，作者提到琉球向中國朝貢的馬“可能從朝鮮、日本或者安南而來”，¹⁸似與明清時期中國冊封使眼中的關於琉球自然環境、社會狀況等方面的記載有所衝突。例如，明代陳侃稱琉球“無熊、羆、豺、狼、虎、豹等猛獸，是以多野馬、牛、豕。價廉甚，每一值銀二、三錢而已；牲雖賤，人有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¹⁹蕭崇業的記載與陳侃類似，稱“野鮮熊、羆、豺、虎、狼、豹猛獸，而獨出鹿；且富馬、牛、羊、豕、雞，形多瘦削，其價極廉”；²⁰夏子陽的觀察大體相同，稱琉球國“野鮮惟鹿，其餘則馬、牛、羊、豕、雞，族類多而價亦廉甚，但食之有腥”。²¹三位明代中國冊封使的記載表明這一時期的琉球本島確有野馬存在，並且價格低廉，這或可證明琉球的馬匹數量不在少數。同時，該地既然有大量野馬，那應該也有馴化的家馬，不過琉球向中國進貢的馬究竟是野馬還是家馬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作者認為“硫黃等物大致得於東南亞”，²²其實不然，硫黃實為琉球本地所產。如宣德二年（1427年）琉球國王遣使乘坐“勝”字號海船前往暹羅購買蘇木、胡椒等物，攜帶

的禮品中就有大量硫黃。完整諮文如下：

琉球中山王為琉球進貢事，為照本國稀少貢物，今遣正使實達魯等坐駕勝字型大小海船一隻，裝載瓷器等物前到貴國出產地，收買胡椒、蘇木等貨回國。應用除外專備禮物詣前奉獻，少伸遠意仍希海納，煩念四海一家從容貿易，早為發趕趁風迅回國便益，令將禮物開坐於後須至咨者，今開奉獻禮物開坐於後：

織金段五匹 素段二十匹

硫黃三千斤今報二千五百斤

腰刀五柄 折紙扇三十把

大青盤二十個 小青盤四百個

小青碗二千個

右咨 暹羅國

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²³

還有《星槎勝覽》中的“琉球國”條，載此處“地產沙金、硫黃、黃蠟。貨用珍珠、瑪瑙、磁碗之屬”。²⁴由此可見，硫黃並非是琉球從東南亞獲得，而是當地出產之物，有時也作為禮品與東南亞國家換取蘇木、胡椒等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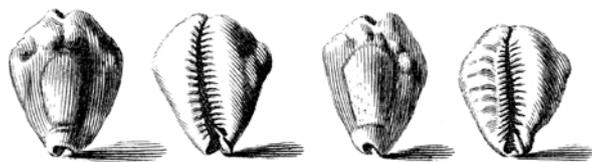
概之，《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是一部真正關於“海貝”的全球史著作，是一本打通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優秀學術著作，值得細細品讀。從個人觀點來看，就“海貝”及其衍生的“貝幣”在全球流通的史學研究而言，短期內應該難有超越其著述的成果。

附：本文為國家重大基金項目“‘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東商旅研究”子項目“明朝回回商旅與貢賜貿易”（項目批號：16ZDA118）階段性成果。

文獻研究

註釋：

1.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8。
2. Jackson, John Wilfrid. *Shells as Evidence of the Migration of Early Cultu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17.
3. Andersson, Johan Gunnar.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Macmillan Co., 1934.
4. Moule, Arthur Christopher. *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5. Hogendorn, Jan, and Marion Johnson. *The Shell Money of the Slave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楊壽川：《貝幣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7. 周智生：〈中國雲南與印度間商貿交流史研究綜述〉，《雲南社會科學》，第1期（2003），頁101-106。
8. 錢江：《馬爾代夫群島與印度洋的海貝貿易》，《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7），頁26-46。
9.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5。
10.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23-24。
11.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233。
12.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69-70。
13. 錢江：〈馬爾代夫群島與印度洋的海貝貿易〉，《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7），頁39。
14.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83。
15.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47。
16. 楊斌：〈“無釘之船”：考古和文獻中最早往返於西亞和中國之間的海舶〉，《海交史研究》，第1期（2022），頁2。
17. 參見（德）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美）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著，陽曦譯：《咖啡帝國：一部嶄新的資本主義全球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英）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等著，扈喜林譯：《綠色黃金：茶葉帝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美）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著，徐軼傑、楊燕譯：《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
18.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194。
19. [明]陳侃：《使琉球錄》，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287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頁27。
20. [明]蕭崇業：《使琉球錄》，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287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頁109。
21. [明]夏子陽：《使琉球錄》，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287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頁258。
22. 楊斌：《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頁194。
23. 台灣大學編集：《歷代寶案（第一集）》，台北：台灣大學，1972年，頁1277。
24.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註：《〈星槎勝覽〉校註》，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年，頁83。





1. Porcelaine rat.
2. Porcelaine id: jeune.

(*Cypraea rattus*, Linn.)
(*Cypraea id: junior*.)